

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PERSON'S QUALITY IS THE KEY TO THE PROBLEM ON CHINA'S POPULATION

周孝正

中国大陆人口在今年4月已达11亿。根据我国最近进行的一次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出生率23.29‰，死亡率7.23‰，自然增长率16.06‰）进行简单外推，中国大陆人口1994年将超过12亿，1999年将超过13亿，到2000年将达13.3亿。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形势十分严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数量增长还不是最关键的。以从黑龙江省爱辉县到云南省腾冲县的直线为界，东南部和西北部人口密度有很大差异。东南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42.9%，而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2人。日本全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25人。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59人。由此可见，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人口数量还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隐藏在数量背后的更为关键的是人口素质问题。

我国人口政策一直是着重强调人口数量的控制，而严重忽视了人口素质的提高。1980年城市妇女平均总和生育率是1.33，在广大农村则是2.84。近年来城市较高智能青年不结婚，不生育现象在悄然增加；与此同时，在文化教育严重“滞后”的农村，1987年生三个孩子以上的多孩率高达15.71%。1987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59，这意味着每10对夫妇平均一生预期生育26个子女。其中，两对“非农业户口”的夫妇生育了两个子女，其余八对农民夫妇则每对生育了三个子女。可见，现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实际上只是限制了较高素质和较优越环境中的人口再生产，却没有能控

制住较低素质和较差环境中的人口再生产。其结果，使我国人力资源总体结构和总体素质逐渐恶化。

本文拟就涉及我国人口素质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身体素质

中国在户籍、住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等许多方面，长期实行城乡严格区别的政策，把城市和农村切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板块，城乡经济运行机制截然不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进入80年代以来，城乡实行的人口政策也明显不同。其后果可以从全国1980~1987年总和生育率的平均值中看出来。

表1 1980~1987年中国大陆各年总和生育率平均值

全国合计	城市街道	农林场	郊区乡	镇	县属乡
2.47	1.33	1.47	2.39	2.43	2.84

文化程度较高的夫妇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那里严格控制只生一个孩子，而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素质较差的夫妇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多生孩子。这就是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实际情况。由此引起我国人口严重的身体素质问题。

众所周知，生了一个患有较严重先天遗传性疾病婴儿的夫妇，再生第二胎、第三胎仍为同样患儿的可能性比一般夫妇要大得多。例如：“先天愚型”发

生率约为 1%，而已生一个先天愚型儿女的夫妇，重现率则为 1%，增大了十倍；前一胎为无脑儿等神经缺陷者，下一胎重现率为 5%，而一般群体发生率仅 1%，相差 50 倍。父亲或母亲一方智能低下，子女也为智能低下的机会高达 58%，双亲智能低下，子女重现的机会高达 72%。按照我国很多省份的规定，凡第一个孩子患严重先天性疾病或后天性伤残，以致影响日后的劳动和独立生活能力者，在优生学原则允许下，可以生二胎。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和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差，以及不正之风等因素的影响，鉴定第一胎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并根据其再发风险率高低、遗传度及 I、II 级亲属有无同样患者，以及是否有产前诊断措施等来确定能否再生二胎是十分困难的。有很多地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最近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优生科学讨论会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我国每年约有 38 万异常胎儿。专家们呼吁，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重视和加强优生优育工作刻不容缓。据了解，1984 年以来，我国优生工作稳步发展，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优生协会，研究会或协作组。但目前全社会对优生工作仍然重视不够。医院缺乏专门人才，优生知识宣传很不普及，产前诊断很难全面开展，有些群众至今对优生优育认识不清，先天性残疾患儿仍在大量出生。

我国农村的通婚圈十分狭小也是导致人口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婚娶不离村的现象反而更为普遍。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张家村，李家庄、王家屯、赵家店，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同宗同族的农民，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生长。婚姻圈的封闭性使人口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近，新出生人口质量下降。近亲婚配编织成巨大的联姻网，是我国农村端正党风，加强法制的严重障碍，也是我国超稳定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至今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已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平均每户四年就搬一次家。我国的资源情况使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但也必须另辟蹊径，解决这个难题。

在我国广大农村，遗传病的诊断水平较低，致使大量高危产妇的生育没有得到监测，大量遗传缺陷病儿出生。发展下去，也势将影响人口素质。总而言之，从身体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实际情况绝不是优生，而是逆淘汰，越劣越多生，越多生越劣是我们必须尽快走出的怪圈，优生优育是当前的

一项严重任务！

科学文化素质

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以自己申报为标准的文盲和半文盲多达 2.35 亿，占统计人口的 1/3。据 1987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我国尚有文盲半文盲 2.2 亿人。

我国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有关文盲的统计标准是以自己申报为准，这是十分含混的，很不严谨的。国务院在 1988 年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工作条例。条例中对文盲和脱盲的标准做出了较严格、科学的规定。

“条例”的第八条是个人脱盲的标准：农民是识 1 500 个汉字（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 2 000 个），能够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帐目，能写简单的应用文。用当地民族语言文字扫盲的地方，其标准由省、自治区制订。在基本扫除文盲的单位，要组织脱盲人员继续学习提高，控制复盲现象。

为了对人口素质进行科学研究，我们按照国务院重新颁布的扫盲条例中关于农村人口个人脱盲的标准，利用客观检测的办法，在农村地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根据的是 1952 年教育部公布的常用汉字表（此常用字表，最初选自《群众急需字》《文盲字汇》《中华基本教育小字典》和旅大、济南、山东、华北、晋察冀五种工农识字课本，进行综合统计后经过多次座谈会研究最后确定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生字典编辑室新编小学生字典，那么小学生阅读和写作需要的常用汉字是 4 260 个；次常用汉字 2 310 个。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GB2312——80 所颁布的常用汉字，则常用汉字是 3 755 个。这次调查所用常用汉字的的确是最低标准所要求的常用汉字了。认识常用汉字是指对该汉字的发音基本正确，包括地区语音、方言中的发音。调查结果如下：1 500 个常用汉字识字率，男性成年人中的 2.3%，女性成年人中的 9.4%，不到 10%；男性成年人中的 5.2%，女性成年人中的 11.7%，在 11—50% 之间；男性成年人中的 10.7%，女性成年人中的 18.9%，在 51—90% 之间；男性成年人中的 3.2%，女性成年人中的 4.5%，在 91—95% 之间；男性成年人中的 20.8%，女性成年人中的 13.3% 在 96% 以上。

如果以认识了常用汉字中 96% 以上为达到个人

脱盲标准,那么以本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推断全国,则结果是:我国总人口中有3.2亿达到了个人脱盲标准中关于识字率的要求;我国总人口中有8亿(包括少年儿童)还没有达到个人脱盲标准,他们今后都有扫盲任务!

这次抽样调查还告诉我们自报文化程度和客观检测的识字率之间有明显差别:有2.5%的人自报为文盲,但实际上基本达到了个人脱盲标准;自报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有80%尚未脱盲;自报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有32%尚未脱盲;自报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有20%尚未脱盲;自报是大专文化程度的人有22%尚未脱盲。

从识字率的年龄分布表中可以计算出:20~29岁年龄组中有51%的人已达到个人脱盲标准;30~39岁年龄组中只有25%的人达到个人脱盲标准;40~49岁年龄组中有32%的人达到个人脱盲标准。30~39岁的人在普教期正逢十年动乱,空有其所谓文化程度,识字率却较相邻的年龄段人口为低。

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解放以后受到两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发生在大跃进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年的在校学生总数是1.1亿人,到1962年下降到0.8亿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生由222万人下降到54万人。第二次发生在十年动乱期间,据估计,至少有100万人未能受到大学教育;1亿多中小学生打乱了正规教育体系而接受了十分低劣的教育,甚至是错误的教育;几百万知识分子无法工作。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深远。“读书无用论”最近几年又在中国大地上兴起。据北京市教育局提供的材料,在全国教育程度最高的首都北京,1988年第一志愿报考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人数是招生名额的78%,高中录取分数线由1987年的510分降到408分。高中新生入学质量的下降,必将导致将来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曾显示:我国以中专、中技以上文化程度为标准,包括大专、大学、电大、业大、职工大学、函授大学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因病退学的原大学生,肄业的原大学生等等,总共全国只有59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这里面还包括自己申报为相当于中专、中技以上文化程度的自学成才的人。

解放前,我国教育事业落后,约80%的人口是文盲,非文盲人口仅20%左右。建国以来,我国持续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历年累计,共扫除文盲1.56亿人,其中1980~1985年期间扫除文盲1500万人。

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文盲大国。我国大陆人口在1987年占全世界人口的21.4%,但是我国大陆人口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却占全世界文盲和半文盲总数的29.6%。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测算,全国12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1964年为2.34年,1982年虽然上升到4.61年,但仍然不足小学毕业的程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79~1985年全国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由87.7%下降到68.4%,1983年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为78.8%,农村小学的巩固率只有60~70%,小学毕业生的合格率只有30%。近几年来,全国扫除文盲工作进展趋缓,每年扫除文盲300多万人,1986年又降为200多万人。据1988年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披露,新文盲还在增长,每年新增200万人以上,而从1985年以来,全国脱盲人数连年下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大量新生的文盲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不断补充到原来水平就不高的劳动就业队伍中去,使全国就业人员的平均文化程度进一步降低。这一大批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目前正在日益愚昧的环境中求生存。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进入中老年时,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他们由于体力下降,智力递减将无所作为。几亿文盲和半文盲是我国现在,特别是将来最沉重的负担!

1981年全国文盲和半文盲妇女的多胎率为40.34%,小学文化程度的为26.91%,初中文化程度的为9.29%,高中文化程度的为3.38%,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6%。文化水平对妇女生育率的明显影响还可以从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结果中看出。我国妇女平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文盲为5.86;小学文化程度的为4.80;初中文化水平的为3.74;高中文化水平的为2.85;大学文化水平的为2.05。可以说,妇女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妇女平均就少生一个孩子。另外,父母的文化水平同子女的文化水平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一般说来,文化程度愈低的夫妇,多胎率越高,生育子女越多,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就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素质高者少生,素质低者多生;城市居民少生,农村居民多生。这种人口发展趋势,将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下降,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结构恶化,形成所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正视这种现实,并以坚强的毅力来扭转这种趋势。

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十分有利于形成我们的危机意识。解放后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把我国以自报为

(下转28页)

这些费用对每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呢？假定现在人口为 11 亿并且静止不变，令上表各项为 W_i ，以 V_i 代表 70 年内每年的人均水平，则有 $V_i = W_i \div 70$ (年) $\div 11$ (亿)，得表如下(A、B、C、D 同上表)：

70 年内人均年负担和受益

A	B	C	D
0%	6.40 元	1.36 元	5.04 元
5%	63.50 元	2.75 元	60.75 元
10%	881.14 元	7.62 元	873.52 元

从上表我们可以认识到，对计划生育的投资具有多么高的收益。

当然，按照这种政策，政府每年要增加一笔钱支付新增加的独生子女费用，即第一年支付 X ，第二年为 $2X$ ，依次类推，一直到 $18X$ 为止，并要保持这个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收入的提高从而支出的增加，则第 18 年，政府的支出为 $18X(1+t)^{17}$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从社会角度看，这笔钱是客

~~~~~

(上接第 19 页)

准的文盲比例由占人口的 80% 下降到 23%，而苏联用同样的时间将不识字人口的比例，从 1920 年的 68% 下降到不足 1%，目前苏联文盲比例仅为 0.2%。1931 年在世界 28 个国家中，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我国为 1 人，居倒数第二位。到了 1978 年，达到了 8.9 人，增长了 7.9 倍；到了 1987 年，又上升到 18.2 人，成绩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大致同时期内，澳大利亚从 13 人增至 203.5 人；意大利从 11 人增至 175 人；日本从 6 人增至 205.2 人；土耳其从 3 人增至 82.4 人；印度从 0.3 人增至 52.4 人 (1976 年)。别国的增长是几十倍，印度甚至增长了 174.7 倍。

观存在的。既然能够生下多余的孩子并能养活到 70 岁，那就证明社会有潜在的能力，如果这些孩子不出生，这笔潜在的费用自然就用到别处去了。如果这笔钱能够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就不存在支付困难。问题是如何将这笔分散在社会的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这个问题将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

以上的计算中，支付费用是以最大值计算的。即取  $B=1$ 。实际上，对那些政策只允许生一胎的夫妇，奖励时可取  $B=0.5$  以下，惩罚时  $B=1$ 。由此，政府对这部分人的支出就减少了一半。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超生现象又比较普遍，我们面临的控制生育的任务是艰巨的。要想成功地控制超计划生育，就要有行之有效的对策。我认为，根据生育效用的分析，只有采取重奖重罚的措施，才能根本解决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农村超计划生育的问题。

本文作者李小平 (Li Xiaoping)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人员。

看到别国进步的幅度和速度，我们难道不应该有点危机意识吗？

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文盲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 1 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人口问题中，我国在人口素质上，遇到的挑战是最根本的。

本文作者周孝正 (Zhou Xiaozheng) 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